

中国国情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分析^{*}

肖翔 武力



【内容提要】新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以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历史时期。新中国65年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妥善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并及时调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应当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社会主义大国 经济发展道路 历史分析

作者简介：肖翔（1984-），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081）；武力（1956-），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9）。

“中国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条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①，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65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基本国情始终未变，当前仍然是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②中国基本国情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历史选择的重要依据，而且也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一、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演变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照搬外国理论。这些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民族众多。人口众多一方面可以降低公共品的人均成本，具有潜在市场规模；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居民偏好的多样化和更高的国家治理成本。在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均耕地有限的条件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工业化中的大国因素研究”（13CJL0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14ZDA007）、中央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课题“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新趋势及对策研究”、北京市重大招标课题“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逻辑研究”的阶段成果。

① 冷溶：《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和内涵》，《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人口众多还意味着粮食紧张,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很困难。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将近6亿,前30年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同时解决吃饭问题。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各民族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以及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都使得解决好民族团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2) 地域辽阔和发展不平衡。中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国土面积广阔通常意味着资源总量大、种类多。中国已经发现的矿产达171种,许多金属矿与非金属矿的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人均矿产储量潜在价值为1.51万美元,仅达世界平均水平的58%;石油、铁矿、铝土矿等重要矿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44%、10%^①。地域辽阔也意味着各地发展水平与条件差异较大。即使不算港澳台地区,仅就大陆来说,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是非常不平衡的,按照东、中、西部来划分,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这种区域之间的非均衡特征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 社会主义大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②推动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既需要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避免出现“地方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还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不可能做其他国家的附庸。中国一方面需要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国防工业,保障经济独立与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有国家利益的差异,还存在意识形态的斗争。

(4) 发展中大国。中国作为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始终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在经济、技术上中国有较大的学习与模仿空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合作的一面。

上述国情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由经济条件决定,还需要考虑政治、国防、外交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曲折探索(1949年-1978年)

1. 1949年-1957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

虽然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工业化探索,但是远未完成工业化。以经济发展较好的1933年为例,制造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9.1%,而在薄弱的工业中,机械工业比重不足27%,手工业占到73%以上^③。近代工业化未能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实现大国经济赶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④的战略任务。当新中国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后,如何加快工业化步伐、尽快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朝鲜战争爆发

① 袁红辉、吕昭河:《中国环境利益的现状与成因阐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③ 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第12、1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以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事业受到严重威胁，更增强了工业化的紧迫感。苏联工业化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契合了新中国在冷战背景下，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地位和追求大国经济独立的需求。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给新中国建设的援助，则进一步促使中国选择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

1953年中国在苏联援助下，开始了以“156项”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建设。为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累，中国仿效苏联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与我国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的要素“比较优势”不符，但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调动大国有资源，在重点工业项目上进行突破。经过“一五”计划建设，我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22.8%。重工业中制造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41.9%，上升到1957年的47.4%。其中生产机器的机械工业比重由1952年的31.9%上升到1957年的37.7%^①。经过努力，中国还缩小了重要工业品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参见表1）。例如，钢铁工业用5年时间完成了美国、英国用12年、23年才完成的增长量（参见表2）。

表1 中国重要工业品产量在国际上的排名

类别	1952年	1955年	1957年
电力	18位	11位	12位
煤炭	6位	6位	5位
钢	15位	12位	9位
水泥	10位	9位	8位

数据来源：《第一个五年工业生产计划的预计完成情况》，引自刘国光、王刚、沈正乐主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1057页

表2 钢铁产量增长的国际比较

国家	时间段	时间	速度
中国	1952年-1957年	共5年	由135万吨增长到498.7万吨
美国	1880年-1892年	共12年	由127万吨增长到500万吨
英国	1880年-1903年	共23年	由129万吨增长到503万吨
法国	1897年-1923年	共26年	由132万吨增长到530万吨

数据来源：《第一个五年工业生产计划的预计完成情况》，引自刘国光、王刚、沈正乐主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1057、1058页

2. 1958年-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积累与消费、重工业与农业和轻工业、国内与国外等关系；微观经济也出现了“管得太死”和激励不足等问题。1956年“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新的探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① 董志凯、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1页。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①。陈云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②，突破了苏联单一计划经济模式。但中国共产党探索符合基本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努力被“大跃进”干扰。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③1958年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席卷全国。在“大跃进”狂热气氛下，农村掀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跃进”期间中央向地方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权力下放，也加剧了这种混乱。三年“大跃进”使得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粮食供给紧张，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国民经济被迫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指导思想下，中央采取降低工业指标，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上收地方经济管理权力，精简城市人口，调整农村经济体制等措施，1963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此后，中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1963年-1965年）继续调整，为“三五”计划打下基础。当时还设想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农业和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④。但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摔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⑤。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三五”计划，从指导思想到计划草案上都实现了向以战备为中心的全面转变。在战备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实施了巩固国家安全、平衡区域发展的“三线建设”战略。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进程，使中国丧失了十年宝贵的发展机遇。

3. 1949年-1978年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绩效分析

1949年-1978年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中国经济依旧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⑥1978年比1952年经济总量增加了371.4%，年均增长6%以上。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条件下，中国保持了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中国在1952年-1978年期间平均投资率达到29.2%^⑦。1975年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发电量也远超过巴西和印度。中国曾被称为“贫油国”，1955年仅为美国、苏联原油产量的1.4%和0.3%，1978年已达24.2%和18.2%^⑧。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端军事工业取得的突破则巩固了我国的国家安全。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⑨从预期寿命来看，中国1949年预期寿命仅为35岁^⑩，1960年为43.5岁，高于低收入国家的41.8岁，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46.7岁；1978年中国提高到66.5岁，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60.9岁。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5、31页。

② 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5、326页。

④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24页。

⑥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⑦ 如无特殊注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⑧ 根据历年《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相关数据计算。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⑩ 李玲、李明强：《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但是在1957年-1978年间,受“左”的错误干扰,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严重挫折。中国GDP与美国、日本相比,分别从1965年相当于他们的9.79%、76.65%下降到1978年的6.29%、14.87%。中国还付出了经济波动的巨大代价,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①远高于世界其他大国(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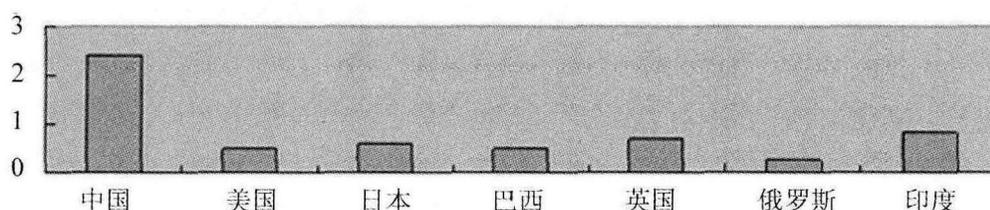


图1 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比较 (1960年-1978年)

注:变异系数为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数据来源: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1979年-2012年)

1. 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与绩效分析

(1) 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 (1979年-1992年)。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②的基本路线,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开放的道路。

中国改革从人口众多^③而计划经济薄弱的农村取得了突破。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得到激活。1978年到1984年粮食总量从30477万吨上升到40731万吨,增加了33.6%;棉花、油料、猪牛羊肉分别增加189%、128%、79.9%^④。

经过1979年-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非国有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自主权增加冲击着生产资料的计划调拨体系。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成为20世纪80年代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价格“双轨制”一方面通过“计划轨”保持了经济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轨”扩大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在价格“双轨制”推进的同时,所有制改革也积极探索。一方面,国有企业进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承包面达78%,1990年达90%^⑤。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抓住市场短缺的机遇,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和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分别达到24%和58%^⑥。这一时期,政府逐步放松了对非公有制经

① 变异系数公式: $C.V = (SD \div MN) \times 100\%$, 其中SD为标准偏差, MN为平均值。变异系数主要刻画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 变异系数越大表示经济越不平稳。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15页。

③ 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1.5%。

④ 蔡昉、王德文、都阳:《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1页。

⑤ 张卓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2页。

⑥ 蔡昉:《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76页。

济的限制。1987年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①。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1978年仅为15万人,1992年为837.9万人^②。渐进式改革一方面通过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维持了国民经济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则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为下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中国还发挥大国区域辽阔的优势,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对外开放。1979年7月19日,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发挥邻近港澳的地理优势,运用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扩展对外贸易,推动了经济发展,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1984年,国务院决定将大连、天津、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建省,成为经济特区。辽东半岛、上海浦东新区、武汉、重庆等区域与城市陆续开放^③。通过渐进开放,一方面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获得了“开放红利”;另一方面尽量为国内企业发展留下空间,减少开放的冲击与阻力^④。改革开放中地方政府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决策权,“财政包干”使其有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2) 1979年-1992年渐进式改革开放的经济绩效分析。1979年-1992年在改革开放推进下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枝独秀(参见表3)。渐进改革使中国防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冲击(参见表4);“四项基本原则”使中国避免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式的政治动荡,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参见图2)。

表3 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1981年-1990年) 单位:%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中国	4.9	8.3	9.8	13.5	13.5	7.7	10.2	11.3	3.7	4.8
苏联	3.1	4.2	4.0	3.3	1.6	2.3	1.6	4.4	2.4	-4.0
南斯拉夫	1.4	0.5	-1.2	1.7	0.2	3.7	-1.0	-2.0	0.8	-4.7
波兰	-11.8	-5.4	5.7	5.7	3.4	4.9	1.9	4.9	0.3	-14.0

注:南斯拉夫为国民物质生产总值增长率,其他国家为国民收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34页。《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但是中国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1992年中国GDP总量仅为美国的6.5%,日本的11%。1992年中国人均GDP为362.8美元,仅为美国的1.4%,日本的1.2%,仍处于贫困国家行列。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

③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34页。

④ 江小涓主编:《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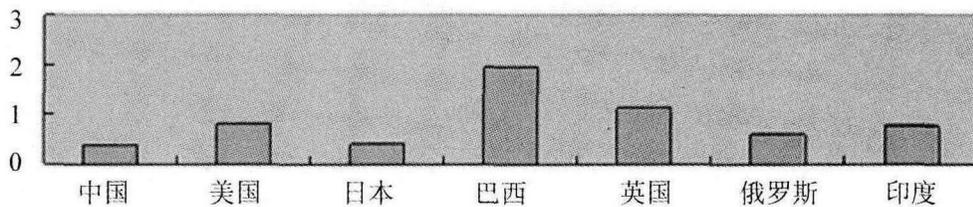


图2 1979年-1992年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

注：变异系数为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表4 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指数（1981年-1991年）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9	1990	1991
中国	102.4	104.3	105.9	108.9	118.5	125.6	134.8	188.1	192.1	197.7
苏联	101	105	105	104	104.6	107.0	111	111.8	117.6	
南斯拉夫	140.9	185.2	261.1	400.0	694.0	1312.0	2891.2	115148.0	783401.0	1399241.0
波兰	121.2	243.3	294.5	341.8	393.4	519.0	687.0	3260.7	22326.0	38082.3

注：①1980=100。②由于部分数据缺失，苏联1987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286、287、336、337页。《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238、239页

2. 1992年-201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

(1)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与告别“短缺经济”（1992年-1997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①等重要论断。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市场化进程加快。

一方面，价格完成从“双轨制”到“市场轨”的并轨。截至1996年，国家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4%，国家计划调拨的重工业生产资料占市场销售总额的比重约为5%^②。另一方面，企业改革加速推进。国有企业普遍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国有工业产值1992年-1996年增加了37.2%；非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工业产值增加了270.2%^③。我国还进行了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逐步推进；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取得重大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改革推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1997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④，终于告别了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短缺经济”。

(2) 扩大需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1997年-2012年）。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71、372、273、375页。

② 成致平：《中国物价五十年》，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768页。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④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950页。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①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为推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一方面积极扩大需求，主要包括刺激内需与外需两个层面。另一方面为增强经济活力，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③。胡锦涛同志还强调了“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采取了刺激内需政策。1997年告别“短缺经济”之后，内需不足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基础上，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运用间接手段刺激经济发展，1998年-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⑤。与此同时，中央还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批重大基础项目上马，有效扩大了内需。2008年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再次部署“四万亿”投资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积极财政政策使得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时期政府还推动了城市化，鼓励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等支柱产业的发展，通过消费结构升级来刺激经济增长。

第二，积极扩大外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不仅加快了国内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且对外投资也直线上升。中国出口2004年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德国，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1982年中国出口占世界比重仅为0.8%，1992年上升为1.3%，2001年为3.6%，2012年跃为10.2%^⑥。2000年“走出去”战略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随着中国进入WTO，我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脚步。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2003年增长了29.8倍^⑦。

第三，所有制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告别“短缺经济”之后，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深化所有制改革成为提高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抓大放小”战略调整之后的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石油、电力、国防、通信、运输、金融等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我国还组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国有集团公司，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执行者。2012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在中国大陆的73家上榜企业中，有68家是国有企业，其中42家是中央企业^⑧。另外，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其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47.7%上升到2011年的71.8%^⑨。

第四，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共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⑩。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一大批公司成功上市，资本市场快速成长。十七大提出，“发展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

④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83页。

⑤ 王兰军：《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替代研究》，《财政研究》2005年第1期。

⑥ 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⑦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⑧ 根据《财富》杂志数据整理。

⑨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⑩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9页。

成机制”^①，要素价格的改革也进入探索阶段。

第五，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和市场经济框架的基本形成，政府职能也由过去的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2003年以来，我国重点进行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其既能够克服困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市场失灵”；又能避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曾普遍出现的“政府失灵”。

(3) 1992年-201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绩效分析。1992年-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中国经济总量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2008年中国突破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2012年中国达到6092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经济增长平稳（见图3），在2008年世界经济普遍疲软背景下创造了“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改善，从预期寿命来看，中国1979年预期寿命66.8岁，1992年为69.8岁，2012年75.2岁（2012年中等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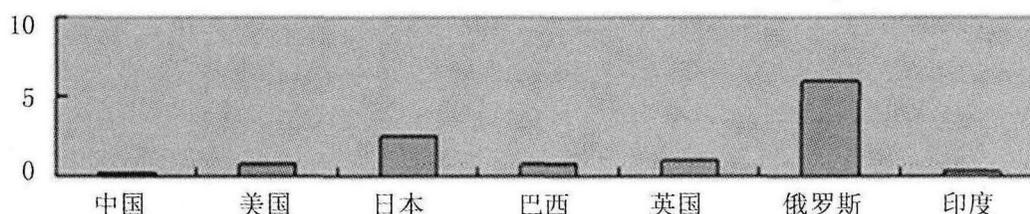


图3 1992年-2012年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

注：变异系数为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计算。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四、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启示

(1)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49年-1978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1956年“八大”曾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②。但1958年又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修改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阶级斗争”不断冲击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达到极致，错失了经济起飞的宝贵时机。1979年我国重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改革开放35年的探索中始终坚持，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苏联戈尔巴乔夫初期进行经济改革陷入泥潭之后，贸然进行政治改革，不仅未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反而带来了政治动荡，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

(2)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赶超，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342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① 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因为弱化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导致了经济下滑，最终国家分崩离析。改旗易帜后的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出现三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则出现了长期负增长，2000年俄罗斯GDP仅为1992年的56.4%。

(3) 要妥善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幅员辽阔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央过度集中权力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过度分权则有可能带来“地方主义”，不利于整合全国资源。从国际经验来看，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导致国家分裂。中国在65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经济分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政治集中又避免了“地方主义”。

(4) 要合理划定和及时调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且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大国实现赶超要发挥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双重作用，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又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动态变化的，需要通过改革不断调整。在经济建设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突破“资本稀缺”的瓶颈；但随着经济发展，管理日益复杂，经济效益不高的弊端凸显，需要加强市场作用。中国从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入手，通过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渐进改革将改革成本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稳定的前提。

(5) 要正确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中国积极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市场，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在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防止外国干涉本国内政。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中国仍然坚持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最终创造了“中国奇迹”。而苏联在改革中乞求西方国家的支持，寻求经济技术援助以求使其摆脱危机。甚至在内政上苏联也听命西方国家，不敢理直气壮维护国家统一，最终加速了国家解体^②。

五、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道路的几点思考

经过新中国65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过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仅有日本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大部分发展中大国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有着13亿人口、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需要进一步探索。通过结合基本国情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分析，我们认为未来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社会主义大国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中国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推动中国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原有的“成本优势”（劳动、资源、能源等要素低价）越来越受到挑战。中国政府未来需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契机，集中力量进行重大科技攻关，例如在3D打印技术、绿色能源、新兴可再生能源技术、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争取实现核心技术的赶超。另一方面应当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产学研良性联动机制，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342页。

^② 陆南泉：《苏联兴亡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0页。

发大国创新活力。

(2) 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的优势, 加强顶层设计, 优化经济空间格局。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中国政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 通过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战略, 整合全国地区资源, 激发大国发展潜力。并且鼓励地方政府依据自身发展阶段性特点, 在国土功能区定位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3)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释放改革红利。第一, 加快要素价格改革步伐, 消除要素价格偏低导致企业走外延型经济发展道路的逆向激励; 第二, 发展混合经济, 将国有企业规模优势与非国有企业经营灵活的优势结合起来, 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 破除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 加强市场监管, 促进大国资源合理流动。

(4) 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当前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背景下, 形成绿色低碳的发展新方式应当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未来应当考虑建立地方官员科学考评机制, 将淘汰落后产能、环境保护等指标纳入官员考评体系; 再就是改革现有的地方政府收入体系^①,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地方政府收入结构; 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消除地方政府的“GDP崇拜症”, 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5) 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协调优势, 通过“共同富裕”, 形成国家发展的合力。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当前没有形成固化的利益阶层和集团。在发展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可以比较好的协调各阶层利益和诉求, 化解经济转型中的社会矛盾。未来应当通过改进收入分配秩序、强化政府二次分配手段、改善公共产品供给等措施、提高人民福利、挖掘大国内需潜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6) 在对外开放中也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大国优势, 实现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优化利用。一方面, 发挥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政治优势, 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实现中国企业对产业链高端的控制; 另一方面, 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增强中国在WTO裁决、碳排放谈判等问题上的影响力, 为实现迈向高收入国家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 [1] Alesina, A. & E. Spolaore, *The Size of Nation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 [2] 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 [3] 高博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
- [4] 陆铭:《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年。
- [5] 欧阳晓:《大国经济发展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6] 武力:《中国发展道路》, 长沙: 湖南出版社, 2012年。

(编辑: 张建刚)

^① 当前土地出让金和工业税收占地方政府收入较高份额, 在这个体系下政府有动力选择外延式的经济发展方式。